

# 经济减速倒逼政府职能转变

熊光清

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转折点。经济减速已经开始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果说,2008年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外生性原因引起的话,这一次,则主要是内生性原因。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能再靠牺牲环境和依赖廉价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增长了。应对新一轮经济减速,依靠投资拉动,也行不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制度上进行大的突破或调整。

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这个经济体的身上,仿佛束缚着千万条绳索,每解开一些绳索,中国经济就能获得新的活力。

当前,中国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还没有改革到位。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直接参

与市场经营活动,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严重扭曲了市场价格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这种行政性垄断往往同经济垄断融为一体,其危害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垄断。由于市场准入制度的不合理,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加上权力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中来,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权贵经济”庞大,部分企业迅速聚敛了大量财富,一些人借此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社会正义遭到严重挑战;大多数企业经营者不能正常管控经营风险,缺乏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

同时,中国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职能过多过大不仅造成政府规模越来越大,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而且导致寻租活动增多,社会交易成本加大,社会资源不能有效优化配置,并扭曲了市场秩序,遏制了市场主体活

的活力。近年来,一些需要政府审批的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走上了市场化轨道的行业并没有出现这一问题,这表明,行政审批是产能过剩根源。此外,任何一个项目,政府忙着“设租”,企业就忙着“寻租”,也导致腐败完全社会化、公开化和制度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使得政府职能转变显得非常迫切,也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很不彻底,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改革的重点正是转变政府职能。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能够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这样,才有利于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运动员角色,健全和完善宏观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政府活动的领域应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领域转向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领域,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重点在于

塑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塑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并制定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为全体公民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应进一步退出市场的直接经营活动,进一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管理行为,政府与企业都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或下放一些投资项目审批权,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给予地方和经济活动主体更多自主权。要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总之,中国政府职能要转变到公共服务、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上来。我们期待中国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使中国经济迅速摆脱困境,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 房地产泡沫远比想象的要严重

李宇嘉

在股市上涨周期中预判顶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等到时钟进入下跌周期的那一刻,我们才能知道顶点在哪里。房地产泡沫也一样,只有在其破灭和发生金融危机的那一时刻,我们才知道泡沫已累积到何种程度。在这之前,没有谁会相信泡沫会破灭,因为房价一直上涨形成了房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不断地自我实现又加深了对于房价上涨的笃信,这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中,而这种预期也不断被巩固。

因此,静态地评估泡沫的大小是不科学的,一定会低估泡沫的潜在威胁和可能的损失,而现在我们对于房地产泡沫的判断就存在这个问题。近期,政界和学界都在评估房地产泡沫的大小和可能产生的损失,主要顺着两条线:一条线是泡沫破灭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主流的观点是房地产泡沫对于银行的冲击有限,理由是我国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一直坚持审慎的原则,房地产风险暴露小于20%,按揭贷款/抵押物价值小于70%,不存在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中过度杠杆利用的情况。而当前银行业1.26%和0.37%的房地产行业不良率和住房按揭贷款不良率也验证了上述观点;另一条线是泡沫破灭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主流的观点认为冲击也有限,理由是我国当前城镇存量住房价值占GDP的比重在75%-120%之间,低于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170%的水平,也低于日本泡沫危机时的350%,2001-2011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每年增长1平方米,低于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发生至破灭时期人均1.5平方米的增长。目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尽管达到了32平方米,但城镇无房产户还很多,住房问题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非供过于求和空置的问题。另外,城镇化还在加速,改善性需求刚开始释放,而存量房也需要更新,真实住房需求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房地产泡沫会走向哪里,或者说房价顶点在哪里,取决于目前推动房价上涨的所有动力将在后续房价走势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是通过政策调控和制度革新来减缓对房价的继续推动,还是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任由这些因素继续推动房价上涨?从政策调控来看,在行政性紧缩措施继续严厉的情况下,对于房地产业的资金供给逐步趋紧,如对于开发商贷款的收紧、投资性杠杆利用的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以及保障房建设等。从制度革新来看,楼市调控长效机制的构建(房产税的推出、土地出让制度改革)、中央地方关系的财税体制改革、疏导投资资金流向的汇率和资本管制制度改革等也在顶层设计和付诸实施中。

上述措施能否减缓房价上涨和阻止泡沫进一步累积?我们至少在短期内还没有看出端倪。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在继续发挥作用,而且这种推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根据微观调研的信息,我们最担心的不是当前房地产泡沫有多大,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房地产的依赖到了需

要泡沫来支撑的地步,这让房价上涨的预期成为不能打破的传说,而这正是未来出现泡沫破灭的征兆。事实上,短期内无恙会麻痹对于问题的长远认识,也会耽搁问题解决的最好时机。

目前,假借中央地方财政事权不对等,假借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财政职能,地方政府将“土地财政”异化到了极致的地步,有意彻底地绑架上层,逼迫其不能收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操纵房价可谓令人瞠目,例如,东部某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2009年扩大内需时期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两个轨道交通建设的项目,201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回调造成该市土地市场遇冷,刚开始施工的1号线和仍旧处于开工前期的2号线全部停工。2012年,为了激活土地市场,政府不仅出台措施来支持房地产二级市场交易,而且要求本地媒体都要一致地报道“房地产市场已经见底,市场回暖在即”,鼓励居民来买房。

其实,这只是地方政府需要房地产泡沫化支撑运转的冰山一角。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对于房地产的依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土地的一级开发基本上是由开发商(有的是融资平台)来承担,条件是让予其他土地或承诺在土地二级市场交易上为其获得土地“量身定做”;政府重大项目(城市广场、会展中心、轨道交通、博物馆等)全部由开发商来做(如BT),条件也是让予其土地;保障房建设基本上也是由开发商来做,条件同样也是让予土地。地方政府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就需要给开发商价不仅不能下跌,还必须继续上涨的承诺,这样才能覆盖建设成本、运营成本和税费、资金成本和利润空间。开发商有地方政府的土地投入或隐性担保,就可以拿政府信用和土地抵押来贷款,进而放大土地杠杆,甚至不惜在上层收紧银行信贷投放时进行更高成本的银行表外信贷融资。银行不能倒、地方政府不能倒,这就彻底地绑架了调控。

企业也需要房地产泡沫化的支持。深圳某知名高科技企业近期向银行申请贷款,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竟然是其办公楼出租收入。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之一就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给出的优惠条件除了税费就是土地。这些企业除了将一部分土地用作厂房和办公之外,大部分拿来建设办公楼和写字楼出租。近年来,随着LED、光伏、多晶硅、风力发电等政府支持的高新技术行业走向产能过剩,行业盈利能力严重下滑。于是,很多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借楼宇出租收益来补贴经营亏损,继续顶着高新技术的光环。因为,地方政府要政绩、企业要政策优惠。

房地产泡沫对于居民个人的影响也不小。今秋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毕业大学生平均工资在2000-3000元,而一、二线城市房屋租金往往占毕业大学生月均薪水的一半以上。作为经济的基础性行业,房地产价格水平(包括租金)理应反映国民经济的真实需求和实际负担。如果连最真实的住房需求都无法承担,大学生会有多高的创业热情?整个社会的实体经济又将如何发展?而这种泡沫又能维持多久呢?

(作者单位: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 舆情时评 | First Response |

# “余额宝”的创新意义

杜志鑫

6月17日,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两者将联手开展网上理财业务,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合作,支付宝推出“余额宝”增值服务,即支付宝中的余额宝闲置资金可以用于购买货币基金。天弘基金是余额宝唯一的货币基金提供商。这掀开了基金业的一场渠道革命。

对于天弘基金来说,这意味着其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带来上百亿元的新增规模。数据显示,目前支付宝已有超过8亿个注册用户,日均交易额超过200亿元,日均交易笔数突破1亿笔,峰值时每秒的成交笔数达到19万笔。2012年全年,支付宝的总成交额达到1.8万亿元。

假如每个用户有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的余额,8亿注册用户只要有1亿用户每人购买几十元货币基金,天弘货币基金就可增加几十亿元,而如果再乐观一点,效果就更好了。因此,到2013年中报,天弘货币基金可能会很轻松突破百亿元规模。

基金公司通过和一家新机构的创新性合作,轻松带来百亿元规模的增加,这绝对是一场渠道革命。经过15年的发展,现在基金业的竞争已经处于白热化阶段。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在中国基金业飞速发展的2006年和2007年,基金业的发展是

靠新基金发行或者封转开、分红等牌照管制推动的,只要基金公司拿到新基金发行的牌照,一天就可以销售上百亿元,还常常由于规模太大要按比例配售。过去那种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因为:一方面新基金发行几乎就是注册制、备案制了,只要申请,即可发行,基金不再是稀缺产品了;另一方面,在基金只数和基金公司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渠道成了瓶颈。现在只要基金公司愿意,比如易方达、汇添富等基金公司一年可以发行20-30只基金,但难就难在渠道。

现在基金公司总是在银行渠道排队等着发行,基金公司想发行更多的基金,但银行发行渠道成了稀缺资源,于是基金公司竞相给银行渠道更高的尾随佣金,除了认购费、赎回费、托管费外,连基金公司1.5%管理费的一半都得给银行渠道,但是即使这样,销售也不容易。

天弘基金与支付宝的合作,开创了一个新模式。对于支付宝的客户而言,总有一部分资金沉睡在那里,货币基金可以提供较低的风险和较好的流动性。天弘和支付宝合作的货币基金,可以像支付宝余额一样随时用于消费、转账等支出。两者一结合,既可提高支付宝客户资金余额的收益率,也可以为基金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基金业走向市场化竞争的路途中,需要越来越多的产品创新、渠道创新。

(作者系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观察员)

## IPO即将重启



赵乃育/图 孙勇/诗

新股重启是必然,理性对待莫悲观。活水方可育生命,股市不能玩空转。努力治愈圈钱病,从严把好上市关。市场机制要尊重,改革压力共承担。

##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 金融创新不可本末倒置



李斌

近10年来,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们中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要把前总理朱镕基为我国经济腾飞所制定的政策框架予以推翻,不能从整体上取消,就一个个地修改。笔者认为,推出国债期货的计划便是这种习惯的又一表现。

提到国债期货,18年前的“327事件”依然让人记忆犹新。有人可能认为,既然都过去18年了,我们从哪里跌倒的,现在总该从哪里爬起来了。于是,他们谈起理论来一套又一套,什么“有利于债券市场发展”、“有利于利率市场化”、“与国际接轨”、“交易机制和监管水平已经提高了”等等。总之,国债期货不恢复,似乎简直就说不过去。这些理由是值得予以逐条批驳的。

首先,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财政状况

相当健康的背景下,目前国债余额很低,而经由公募发行因而需要公开交易的国债现货就更少了。只要经济发展不陷于停滞,可以确信的是,国债发行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活跃起来。现货交易尚且不活跃,何谈期货?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显著不同。主要西方经济体长期依赖于大量的国债发行,这种情况下,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当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国际标准”,照猫画虎地“与之接轨”。我国应当尽力避免重走这条不成功的凯恩斯主义路线,因此也就用不着提前准备国债期货市场。退一步讲,即使国债发行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将会显著地扩大,届时再开期货市场,自然是来得及的。

国债期货支持者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利率方面,即国债期货市场的走势可以及时反映市场利率的走向,为各方面提供决策参考。然而,现有的反映利率趋势的信号是多种多样的,国债期货真的那么不可或缺吗?为了得到一个仅供参考的信息,就要开设一个市场,这是本末倒置的,是讲不过去的。最为重要的是,我国银行业和利率市场尚未实现自由化,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政策仍然在总体上维持着18年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自由交易”和“价格发现”呢?无论金融改革,还是其他改革,合乎常识的顺序总是先放开对现期交易的管制,尔后

再考虑期货交易;怎么能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先去搞期货交易呢?说得轻一些,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述是次序错误,轻重不分;说得重一些就是在为腐败官员、投机分子和利益集团提供方便,开辟财源。

30多年来,这种“半开半闭”的市场结构已经让权势阶层大发横财,让广大群众吃尽了苦头。今天,当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反思以及新一轮改革方案正在规划之际,这老一套又要争分夺秒地降临了。官方的政策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股市的走势。由于股指期货的开启,腐败势力已经可以利用内幕信息很容易地、每日每时地在期货市场中套利。可以设想,如果再有了国债期货,那么,除证监会之外,央行与财政部又将再次被寻租者们包围,届时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政策机密不仅有泄露之虞,政策本身还可能因此而被改变。

至于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就暂且不要指望国债期货了。道理如上所述;重要的是企业债券可以自由发行和交易,切勿舍本逐末,装模作样。据说某些企业的风险管理业务对此有“迫切要求”,笔者冒昧揣测,恐怕这只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经理们不知道如何在与教科书不相符的条件下进行风险管理吧。“风险对冲”的“科学管理”搞了几十年,全球到处都充斥着危机与危机的阴影。在有严重缺陷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金融创新”

一词已经蜕变为某些高级骗术的外衣,并因此而臭名昭著,某些国企也在遭受巨额损失后于不久前刚从期货市场的“风险对冲”中脱离险境。因此,笔者奉劝这些企业:要想长寿,期货公司的推销员们远一点儿!

好了伤疤忘了痛。继十几年前对金融机构的大救援之后,我国至今很少再发生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决策者们仍然遵循着“先实体经济、后金融行业”的改革次序。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和灵活性要与实体经济的节奏相符合;过于灵活和积极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这是一条可以在理论上设法加以证明的命题(“算法经济学”可以服务于这个目标)。可是,有这样一股力量,他们以“金融自由化”的名义,长期地、不遗余力地鼓动政府加大对投机活动的支持力度,呼吁股票交易实行T+0以及放宽涨跌幅限制便是这样的例子。在股票与土地的一级市场尚未放开的前提下,把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首先排上议事日程的做法是与此相一致的。笔者当然不是反对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是说,错误的改革次序向来害人不浅。多年来,总是大脑血管动得多,小脑血管动得少;实打实的举措少,花里胡哨的玩意多。笔者更是怀疑,有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要把这简单的次序搞错,以利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特点,为自家快速地聚敛钱财。